

绪 论

毒品是万恶之源。最早从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毒品是鸦片，而鸦片是从罂粟的果实中提取的。鸦片具有很强的麻醉性，若长期或超量使用很容易成瘾和中毒。鸦片成瘾后需要经常吸食或服食，不然就会六神无主，烦闷异常，呵欠频发，涕泪满面。只有不断增加鸦片的用量，加快吸食的频率，才能维持原先的快感和梦幻状态。久而久之瘾君子的脑组织机能受到损伤，神经中枢发生病变，身体某些部位出现充血、出血的症状。

在清代乾隆末期嘉庆初期，有人将鸦片切成碎末，放入水中搅匀，再把切成丝状的烟草放入鸦片水中搅拌均匀烘干，这就是当时的新型毒品——鸦片烟。^①“其烟入腹能益神气，彻夜不眠无倦色。……若连朝不辍，至数月后，则浸入心脾，每月非如期呼吸则疾作，俗呼为瘾。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②

从清同治年间开始，比鸦片更毒的吗啡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

^① 参见王宏斌：《禁烟史话》，第13~1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第2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以下简称《鸦片战争》）

西药房里作为戒烟药公开出售。吗啡是一种棕色、浅黄色、白色或无色的结晶粉末，具有极强的中枢性镇痛作用。与鸦片一样它同时又具有镇静作用与止咳作用，能使使用者产生无以名状的快感，但它对人的呼吸、循环、消化系统有副作用，而且具有比鸦片更大的成瘾性。鸦片所含的生物碱仅百分之二十左右，而吗啡的纯度比鸦片高得多。吗啡除了口服还可注射，使用起来更为方便。因此一些人用吗啡戒了鸦片烟瘾后又染上了吗啡瘾而不能自拔。但吗啡“一不注射，则立僵死，并手足不能动”，且“每注射一次，即留一黑点，终身不退。注射至三四年，则全身斑点，无复容下针之处，其人亦垂死矣”。^① 鉴于吗啡有极大的毒害性，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明确规定，不准进口。至1907年初尚未与中国改订商约的多数国家也允诺禁止吗啡和吗啡针入华。

从清朝末年开开始，中国各地的西药房又以戒烟药的名义推销海洛因。海洛因是对吗啡进行化学处理后得到的一种粉末，其颗粒越细，颜色越淡，纯度越高，其纯度最高的是4号海洛因，其他纯度较差者依次为3号至1号海洛因。海洛因的镇痛能力是吗啡的4至8倍，只要使用一两次即可上瘾，且很难戒除。由于海洛因多为白色粉末，民间称之为“白面”、“白粉”、“白药”。当海洛因刚开始传播不久就有人指出：“最毒无如海洛因，吗啡虽烈逊三分，高居鸦片红丸上，北地人多白面称。”^② 红丸以海洛因、吗啡为主要原料，加上砒霜等制成黄豆状，清末出现时外表呈粉红色，故名。红丸烟味清淡，吸食后会产生比鸦片更奇特的

《朱执信集》上集，第42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刘豁公：《上海竹枝词》，上海雕龙出版社1925年版。

效力，因此在民国时期极为流行。

至抗日战争时期白粉已有三等：甲等是 666，乙等是 670，丙等是 707。“其中以 707 为最毒，不抽鸦片的人，只要吸上五分，就能死亡；有毒癖的人吸了，虽然不会即时死亡，但生命也会缩到极短，从此死亡的人数，要比从前多得多了”^①。海洛因的长期吸食者“瞳孔缩小，说话含糊不清，畏光，身上发痒，身体迅速消瘦，容易引起病毒性肝炎、肺气肿和肺气栓塞，用量过度会引起昏迷、呼吸抑制而死亡”。^②

中国近代的有识之士曾多次指出鸦片等毒品的危害，并采取行动与之作斗争。林则徐在致道光帝的奏折中坦陈，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③ 锡良在 1907 年上奏朝廷，认为“数十年以来，国势之所以日弱，外侮之所以日烈者，实由民气不张，民气不竞之故；民气、民力之所以颓坏若此者，则鸦片为之也。小民不去其毒，则农、工、商业何由而兴？官士不去其毒，则吏治、军材、学堂教育之绩何由而进？”^④ 进入民国之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全国教育改进会等 30 多个社会团体在 1924 年 8 月成立中华国民拒毒会。该会强调：“鸦片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工具，为军阀官僚生存之命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第 1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 35 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8 年版。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01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锡良遗稿·奏稿》第一册，第 650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脉，实三民主义之劲敌，亡国灭种之祸根。”^①

在民国时期还涌现了不少揭露烟毒祸害的文艺作品，具有强烈的警世意义。由许复民编剧的文明戏《黑籍怨魂》民国初年问世后，曾在上海长演不衰。1916年该剧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后，再次引起轰动。1920年四川内江文人刘师亮的长诗《烟哥自叹》在《师亮随刊》上公开发表，诗中控诉鸦片“害比虎豺”，“害得我精神丧败，害得我如痴如呆。害得我行如风摆，害得我枯瘦如柴。害得我夫妻断爱，害得我父子离开。害得我人亡家败，害得我出丑弄乖。害得我家产变卖，害得我高筑债台。害得我常常戳拐，害得我累累受灾。害得我成精作怪，害得我十死九埋。害得我居卑处矮，害得我悔滥胸怀。想当初，悔不该，烟哥身世亦雄才。到而今，放悲哀，千悔万悔悔不转来”。^②上述16个“害得”生动、形象地道出了鸦片吸食者的心头怨恨和切实反思。

在甘肃还流传着讥讽吸烟成瘾的人的《九了歌》，比《烟哥自叹》更为通俗易懂、入木三分：

面黄肌瘦精神少，有病了；
身上穿件破烂袄，底丢了；
不论干湿就睡倒，瘾发了；
妻室儿女哭号啕，不管了；
父母无病逝故早，气死了；
不完钱粮不纳草，地卖了；

《拒毒月刊》第15期，第10页。

转引自《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1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赤身露体到处跑，拆光了；
日窃夜盗人人恼，不远了；
走在野地尸难找，狗吃了。

当时在民间流行的对联中也有抨击鸦片毒害的。如武汉的对联云：

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声震地；
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廓，不见烟火冲天。

西安的对联则谓：

油灯一盏，烧掉祖宗万代业产；
竹竿半截，打倒天下英雄豪杰。

既然人们从上到下对鸦片的危害都有所认识，为什么鸦片等毒品依旧如此流行，而且有逐渐蔓延的趋势呢？这一问题与鸦片本身的作用有关。首先，鸦片可作药用。《本草纲目》上记其性能为止泻痢、固脱肛、治遗精久咳、佣肺涩肠、止心腹筋骨剧痛。《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滇略》卷三记载，鸦片“可疗泻痢风虫诸症，尤能坚阳不泄，房中之术多用之”。其次，鸦片有兴奋作用，能刺激脑下皮质，焕发精神，使人产生一种无以名状的快感和梦幻，从而暂时将现实中的烦恼和忧愁扔在一边。演员上台前过足了烟瘾，唱起来音色洪亮，精神抖擞。轿夫、纤夫为了让自己能够胜任负重跋涉，也要吸足大烟。对于生活在穷乡僻壤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娱乐的贫苦农民来说，一天劳作下来抽上几口鸦片解乏提神，几乎成了惟一的休闲方式。鸦片烟也随之成了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 568~569 页。

② 《禁毒全书》上册，第 408 页。

同上书，第 448 页。

一种聊以解愁暂时忘却生活烦恼的娱乐用品了。第三，从经济效益来看，在旧中国种植罂粟比种植任何一种农作物回报率都高，而且罂粟的生长对于土壤、气候的要求并不是太高，有些不宜生长粮食作物的地方罂粟倒是安然无恙。农民在别无经济收入来源的情况下自然不愿轻易放弃种植罂粟，即便在官方严禁时期也会躲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偷种。

在这种情况下形形色色的毒贩便纷纷破门而出，使尽浑身解数来抢夺鸦片市场，抢占鸦片市场的份额。他们只顾自己赚钱捞银，根本不管鸦片等毒品造成的社会危害。鸦片生意的暴利吸引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者、旧中国的官僚政客以及各地的军阀、土匪和奸商。他们无不把鸦片买卖看作是摇钱树、聚宝盆。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鸦片利益不惜悍然发动侵略战争，迫使中国官方接受他们的意志和安排。英国主要是对中国实行鸦片输出，日本则在鸦片输出的同时大力在中国就地种植、生产和销售鸦片等毒品。外国毒贩在华的贩毒活动是造成中国近代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病夫”完全是外国侵略者毒化中国所造成的恶果。

官僚政客为了搜刮钱财，解决财政困难，往往置信誉、‘责任于不顾，他们饮鸩止渴，开放烟禁，以“寓禁于征”为幌子，力图实行官方垄断的鸦片贸易，结果使烟毒更加泛滥，长期难以收拾。

军阀、土匪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收匪为兵、纵兵为匪、兵匪合一是常见的社会现象。军阀、土匪为了达到称霸一方的目的，念念不忘扩充武力，而为了维持这些脱离生产的武装力量，广开财源，往往采取以烟毒养军（匪），以军（匪）护烟毒的方法。

无商不奸，反映了旧时民众对商人的一种偏见。然而用在鸦片生意场上是千真万确、丝毫不差的。鸦片商人们为了走私牟利，拉拢腐蚀执法稽查人员，与他们串通一气坐地分赃。在路子尚未打通、关系尚未搞定的地区，鸦片商们或结伙成群，武装闯关，或雇佣男女，利用人体肛门、阴道等器官藏匿毒品、蒙混过关。

中国近代的贩毒群体，有外国侵略者，也有本国人；有在朝的军政官员，也有在野的土匪、奸商；在奸商中又有兼营与专营之分，有散户、小户与大户之别。在鸦片等毒品这一特殊的商品经营领域中（民国期间称之为“特业”）如同在其他商品经营领域中一样，贯穿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激烈竞争。操纵毒品市场的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宣称“寓禁于征”的官府衙门，而在第一线厮杀打拼的则是有中外反动统治者明里暗里支持的专业商号与公司。一些偶尔为之的散户、一些无特殊政治背景的小户尽管人数很多，但能量甚小，他们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在中国近代贩毒史上并不占主导地位。纵观中国近代史，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国侵略者是最大的贩毒者。其次是鼓吹“寓禁于征”、统治人民的各级官府。是它们决定了鸦片商人的命运与地位（非法或合法），决定了上市交易的毒品的数量与价格（如果实行官卖的话），从而也就顺理成章地夺走了毒品贸易的大部分利益。

那些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经营鸦片等毒品的散户的生意带有极大的投机性。要么侥幸过关，连本带利，赚上一把；要么遭到查缉，血本无归，甚至送命。

由于政治的腐败，在毒品贸易领域中出现了官商勾结狼狈为奸的情况。通常是专业的商号、公司不断向官方行贿、报效，官

方则为他们提供保护。有些官员甚至与贩毒大户合伙经营。因此在鸦片等毒品贸易中事实上存在着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各种形式，而且只做不说的暗箱操作又占了很大的比重。为了抢夺鸦片利益，官方以及与官方有密切关系的大户竭力盘剥，压抑小户、散户，而小户、散户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不得不走上团伙化、武装化的道路进行抗争。从总体上看，这是一场大狗与小狗、饱狗与饿狗的狗咬狗的争斗，并不具有真正的反帝反封建的深刻内容。

官方、大户的兴风作浪，小户、散户的推波助澜带动了毒品业的畸形繁荣，然而这种繁荣是以民众身心健康受损、经济凋敝和国运衰落为惨痛代价的。民众有限的购买力消耗在鸦片等毒品上面，用来投资正常的生产建设的资金自然处于经常性的紧缺状态，严重影响了中国近代生产力的发展。贩毒吸毒的流行又刺激了色情业、赌博业的兴盛，引起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的堕落。鉴于有些人既是瘾君子又是嫖客、赌棍，于是有些烟馆老板或与妓院、赌场老板联手搞一条龙配套服务，或者自己兼营色情业和赌博业。反过来妓院、赌场的老板为了吸引主顾，也往往同时供应鸦片等毒品以助兴。因此人们旧时把“黄赌毒”并称是有道理的，三者都是一种慢性自杀。瘾君子们在毒资耗尽后，就变卖田产、家产甚至卖掉自己的妻子儿女。到了实在一无所有时，为了满足毒瘾，便铤而走险，杀人抢劫，无所不为，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新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历届旧政府并非一无所知，它们有时还会在社会舆论、进步力量的推动下实行禁烟禁毒，但鲜有善始善终者。究其原因，这些旧政府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禁烟禁毒之所以难以为继，就在于有巨大的鸦片毒品的利益

驱动。同时历届旧政府也很少考虑开展替代种植铲除毒源，即使有所考虑也根本拿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贯彻落实。另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是阻碍肃清烟毒的两大恶势力。帝国主义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租界、居留地为基地，以军舰、船只为运输工具，以本国人或加入该国国籍的中国人为主力，源源不断地将鸦片毒品运入中国境内。事实上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的各地军阀对于中央的政令阳奉阴违或干脆置之不理，为了扩充实力、扩大地盘，他们往往惟利是图，另搞一套。即使中央政府有较完整的禁烟禁毒方案，到了他们手里无不大打折扣或以各种借口另做文章。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带来巨大毒品收益的大烟贩们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成了各路军阀争相罗致的活宝、合作经营的伙伴。自然，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应付舆论的谴责和上级的检查，捕杀几个小烟贩，做做样子，也在情理之中。

在中国近代贩毒史中，禁毒和贩毒始终是一对矛盾。在这一总题目下往往会出现名为禁毒实为贩毒、短期禁毒长期贩毒、禁人贩毒自己贩毒以及禁毒与贩毒并存等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过分相信文本文件可能会与历史的真实相距甚远。有关禁毒的文本文件只有得到全面、彻底的落实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反之只是遮羞布或骗人的幌子。

中国近代的贩毒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生死、社会的安危、民族的存亡、国运的兴衰，因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主观、客观的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活动概莫例外。离开了对具体的人物（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的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也不可能较为

精确、细致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只有在研究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对一些中外烟贩有所论列，其余均语焉不详。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帮会史、黑社会史、地区经济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对一些有关的毒贩有了较扎实的个案研究。特别应当指出的，1997年1月和9月苏智良先生、王宏斌先生先后推出了各自的力作《中国毒品史》和《禁毒史鉴》，对毒品在中国的危害作了长时段、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给了笔者以不少启示。与上述专著不同，本书并不是一部全面研究禁毒的专著。本书的重点是研究毒贩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他们的社会网络以及经营之道，因此在论及禁毒时，重点也仅放在禁止毒品的贩运方面，对于其他的方面则有意淡化，很少落笔，这点务必提请读者注意。如果本书的出版能为目前战斗在缉毒第一线的公安执法人员提供某些历史的启示，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坚定“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的信念，作者将不胜欣慰。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毒贩 在华的活动

第一节 从事鸦片贩卖的公司洋行

一、东印度公司

中国近代鸦片烟毒的来源可追溯到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1600—1858）是英国在东亚实行殖民掠夺的重要工具，“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① 1786 年英国议会进一步规定，东印度公司对于航行于中国领有执照的港脚商人有充分的管辖权力。在 1767 年之前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仅 200 箱，大规模向中国输出鸦片这一毒品的始作俑者即为东印度公司。

1773 年经英国上校沃森和副董事长威勒尔的建议，东印度公司开始与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在澳门西南海湾下碇的轮船上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257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立起囤积鸦片的堆栈。1794 年公司又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广州港的附近，作为新的鸦片堆栈。鸦片的入口量随之迅速增加，至 1796 年进入广州的鸦片已有 1070 箱，在当地商行中公开发售。清朝政府对此作出反应，下令裁去海关的鸦片税额，完全禁止鸦片进口。在这之后，东印度公司选中了澳门作为向中国内地走私鸦片的重要集散地。

1797 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在印度的鸦片生产。虽然它当时已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伪善地禁止公司自己的轮船经营鸦片的买卖，但在公司发给与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不得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违者处以罚金。这就是说，东印度公司特许港脚商人继续推销东印度公司自产的鸦片。1800 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 2000 箱。

从 19 世纪开始，东印度公司不顾清朝政府的禁令，“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① 贩卖鸦片有惊人的暴利，1813 年印度上等烟土每箱的成本是 237 卢比，而东印度公司在市场上的拍卖价（含出口税）是 2428 卢比，每箱可获毛利 2191 卢比。按当年输入中国的约 3800 箱鸦片计算，总毛利当在 832 万卢比以上。

1805 年东印度公司与澳葡当局为了争夺鸦片利益发生了公开冲突。这年东印度公司对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葡萄牙商船强征 20% 的货税，澳葡当局立即报复，不准任何非葡萄牙商船在澳门卸下鸦片。后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即英国人在澳门贮存、销售鸦片必须雇请葡萄牙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当按照鸦片销售量提

取一定数量的佣金。

1816 年英国在印度开放了自由贸易，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仅仅限于茶叶贸易一项，这就大大推动了走私商人的活动。1817 年印度“公班土”（上等烟土）每箱拍卖价是 1785 卢比，而在中国的卖价高达 2618 卢比，可获利 833 卢比，折合洋银 400 多元。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偷运进中国的鸦片数量直线上升，1820 年为 5147 箱，1821 年为 7000 箱，1824 年为 12639 箱，1834 年达到 21785 箱。同时由于清政府方面的禁烟，鸦片堆栈从黄埔、澳门转移到珠江口的伶仃岛附近洋面。

1834 年 4 月 22 日，根据英王威廉四世的敕令，东印度公司买卖中国茶叶的特权被取消了，而且一切商务必须完全停止。马克思指出：“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个时代”。^②

二、英美洋行

继东印度公司以后，在中国继续偷运贩卖鸦片的是一些英国、美国的洋行。其中最大的一家是英国的怡和洋行。

怡和洋行是英国港脚商人查顿和马地臣在 1832 年正式开办的，其前身是 1828 年开办的查顿、马地臣公司。

查顿（1784—1843），外科医生出身，先是在东印度公司往来广州和英国间的货船上充任医师，由此熟悉中国情形。19 世纪 20 年代初查顿来到广州贩运鸦片，“盘踞粤省夷馆历 20 年之

费成康：《澳门四百年》，第 20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27 页。

久，混（译）号‘铁头老鼠’^①。这一诨号源于某一次当他代表英国商人请求两广总督开放贸易时头被掉下的竹竿打了一下，然而却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据 1839 年 2 月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的奏报称，查顿“来粤贸易已十有余载。其初资本甚微，既合众夷之财，以操奇赢之术贾逾三倍，驯至坐拥厚资，无与伦数。趸船所贮鸦片多半系其经营。该夷仍坐省照料。奸夷效尤，因以日甚。虽数十年来卖烟不自该夷始，而该夷实为近年渠魁”。^② 1828 年他和马地臣合组的公司年走私鸦片 6000 箱，获利 10 万英镑。1832 年怡和洋行开办后，该洋行派出的鸦片船当年就开到了辽东湾。次年查顿又指使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乘船北上，卖掉了价值 53000 英镑的鸦片。1836 年 11 月广东官府决定驱逐查顿，但他借口清理账目又在广东逗留了两年。查顿曾经夸耀过“走私鸦片，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在最好的年头，每箱鸦片的毛利可高达 1000 银元。然而当他被中国官方驱逐后就凶相毕露，在 1837 年 11 月公开提出，派遣更多的武装的欧洲船只到中国沿海兜售鸦片是目前惟一可行的办法。1839 年 1 月 27 日查顿为了逃避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通缉，从广州逃到澳门。1 月 30 日搭轮船回国。

怡和洋行的另一个老板马地臣（1796—1878），生于苏格兰。他先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协助叔父经商，1818 年来到广州，在这之后一直在广州和澳门贩烟，并开始在中国沿海进行鸦片走私活动。1821 年 11 月他的三只鸦片走私船“米罗普”号、“胡兰”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 49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同上书，第 470 页。

③ 《近代史资料》总 21 号，第 40~41 页。

号、“犹金尼”号遭到两广总督阮元的罚款惩处，并被勒令驱逐出境。两年以后他又派船驶往福建泉州。1828年他与查顿合组公司后，为了进一步扩大鸦片生意，专门在澳门创办了《广州纪事报》，每期公开登载鸦片行市的信息。1829年至1830年间，查顿、马地臣公司经销鸦片5000箱，价值450万美元，约占同期中国进口鸦片总数的三分之一。1832年怡和洋行成立后，建立起一支专门在中国沿海进行鸦片走私的船队，其中的“红色海盗”号、“气仙”号、“发尔康”号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几艘鸦片飞剪船。

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东实施禁烟时，马地臣留在广州顽抗，4月间一度在广州商馆中被困。后来他被迫交出鸦片7000箱，被林则徐驱逐出境。

查顿回国后，拿了在华英国鸦片贩子集资提供的活动经费，到伦敦向政府施加影响。9月下旬他带了不少有关中国沿海的地图等情报资料，秘密会见外交大臣巴麦尊，讨论发动侵华战争的种种细节问题，并竭力建议英国政府迫使清政府除了广州外再开辟上海、厦门、福州、宁波为商埠。在这之前查顿还向无耻文人瓦伦尔提供资料并进行资助，写了一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鼓吹对华进行军事报复的小册子《鸦片问题》，在英国上下议院广为散发。根据查顿等人的提议，巴麦尊于10月1日的英国内阁会议上提出了发动侵华战争勒索鸦片赔款的计划。该计划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先后被英国政府、议会所认可。因此毫不夸张地讲，查顿等鸦片贩子是鸦片战争的策动者之一。作为百万富翁的查顿后来还当选为国会议员，马地臣被封为爵士。1842年马地臣用卖鸦片赚来的黑心钱买下了苏格兰西海岸的路易士岛，并将其辟为私人庄园。

鸦片战争以后，怡和洋行从澳门迁至香港，成为向中国内地推销鸦片的重要批发部。1843年1月璞鼎查为了欺骗舆论在香港发布命令称：“鉴于中国皇帝的谕令和律法已经公布鸦片贩运是非法的……如果英国臣民从事这一贸易，将不会得到女王陛下的领事和其他官员的保护和支持。”^①马地臣很快领悟到这一命令的实质是向英国公众表明英国政府与鸦片贸易毫无干系，因此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公使发表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布告，等于零！是说给英国的圣人们听的。亨利爵士（即璞鼎查——引者注）绝不会想到要去执行它，而且私下肯定会把它当作一个绝妙的玩笑。不管怎么说，他准许鸦片在香港上岸和存放。”^②五口通商之后，怡和洋行的“开路者”号很快出现在厦门的海面上。

在英商中仅次于怡和洋行的是以颠地为首的宝顺洋行。其前身是1832年组建的颠地行。颠地是“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此人“递年逗留省城，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多半经其过付”，^③因此他是林则徐准备查拿严办的贩烟要犯。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颠地仍在广州不走，组织煽动鸦片商人破坏禁烟。颠地的上述活动得到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公开支持。1839年3月下旬义律乘快艇抵达广州，企图接走当时被困在商馆中的颠地。不料当天林则徐采取果断措施，下令封舱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包围商馆，切断商馆与外界的联系。因此义律此行没能达到预期目的，结果颠地被迫交出鸦片1700箱，并在具结永远不敢再来的

^② 《在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第159页，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31页。

林则徐：《信及录》，《鸦片战争》（二），第244页。

甘结后才得以离开广州。

宝顺洋行拥有一些在华走私鸦片的快艇，其中有“水妖”号、“伊芒特”号和“韦德·戴雷尔”号等。鸦片战争结束后，宝顺洋行并没有停止鸦片贩卖，1850年该洋行的“阿美士德勋爵”号三桅帆船停泊在厦门港湾。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第三大的洋行是美国鸦片贩子开的旗昌洋行。该行始建于19世纪20年代。从30年代起，旗昌洋行为了便于武装走私，购置了一批美国特制的鸦片飞剪船，其中有“玫瑰”号、“气精”号、“西风”号、“妖女”号、“羚羊”号等，大规模地从事中国沿海鸦片走私生意。有一个飞剪船上的职员写道：“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和流氓式的中国人较量一番，一两艘官船决计把我们赶不出航线。”^①1837年在旗昌洋行同类船只算是较小的注册吨数为150吨的“玫瑰”号把“一批在广州卖妥的鸦片运到南澳交货，并且有另外若干箱鸦片烟带去试卖。整船的货差不多有三百箱，广州价格是30万元”^②。当它驶抵南澳岛时，与两艘中国战船遭遇，亨德等美国烟贩按惯例向中国官员行贿，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③亨德（1812—1891），1825年来华，在一家美国公司的广州代理处当学徒。1829年在旗昌洋行任职，1837年至1842年是该洋行的合伙人。此人在华从事贩鸦片生意历时40年。他曾振振有词地自我辩解，胡说“吸鸦片这种习惯，和我们有节制的饮酒是一样的。至于和美国、英国所使

[美]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9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美]威廉·亨德著、林树惠译：《广州番鬼录》，《鸦片战争》（一），第266页。

同上书，第266~268页。